

## 1840 年（道光二十年）

鸦片战争爆发。这是由英国向中国非法倾销鸦片而引起的中英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大冲突和总较量，也是中西两种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长期隔绝和骤然相遇而形成的大震荡。从此，古老封闭的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门户，开始进入了一个被纳入到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并引起了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进入中国，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与此相伴随，中国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等方面，也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随着中西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激荡和交汇，出现了许多色彩斑斓、新奇特异、意味深远、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鲜事物，形成了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开始走向近代的广阔画面。鸦片战争后半个或多个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总的变化趋势是：由以往的闭关自守，转而为面向世界；由过去的封建传统天下，变而为向近代化的趋进。

经世之学的复兴与变革思潮的发轫

以读书、应科举、入仕为毕生志业的士人阶层，既是统治阶

级的社会中坚和官僚后备队伍，也是中国文化的社会载体和集中代表，他们的动向往往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动。这一时期，在社会变动的同时，士人阶层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文坛学风的衰败。清代统治者长期奉行尊崇正统儒学、排斥异端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推崇程朱理学，把朱熹尊为圣哲；一方面大兴文字狱，搞文化高压。在这种学术导向和思想钳制之下，广大士人或则埋头于科举，或则潜心于汉宋之学。宋学（即理学）和汉学（即考据学）是清代文坛并立的两大学派，到了清中叶以后，两派相继趋向衰落。宋学阐释义理，兼谈心性，由于其提倡“正人心”、“明天理”，讲究恪守“三纲五常”，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以，被清朝廷奉为官方哲学。科举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取士标准，士子自蒙童即诵读此书，因此，读书人都受到过理学的熏陶。及至入仕后，士人与官吏身份集于一身，官场士大夫也多以讲求宋学相标榜。随着政治腐败的加剧，官吏士大夫争相钻营、争名逐利之风日盛，宋学不仅日益空疏、迂腐，讲求理学的人也往往言行不一，假道学盛行，这就使不少士人对宋学产生厌倦。

汉学家反对宋学的空谈性理，提倡考据训诂。清朝前期在统治者的提倡和文字狱的挤压下，汉学曾经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但自嘉庆朝以后，社会危机加剧，人民反抗日多，汉学即日益显得繁琐而无用。一味埋头于故纸堆中的汉学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指责，如有指其“术愈精而人愈无用”，认为“今之墨守汉学者，往往愈引而愈晦，抱残守阙，远证冥搜。……而一遇事全无识见，一举念只想要钱”<sup>①</sup>。嘉道之际，汉学继宋学之后，也已日趋衰落。

在广大士人或奔竞于科举之途，或埋头于无用之学的风气之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 14 《读经一》。

下，人们不以真才实学为重，而以追求声名、争逐利禄、投机钻营为能事，由是导致道德败坏，学术枯萎，士习衰恶。时人哀叹当时士风是：“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sup>①</sup>有人甚至认为：“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sup>②</sup>这样的学风和士习，导致广大士人目光短浅，思想僵化。因此，在社会危机、重大事变来临之际，不仅当权者或习焉不察，或束手无策，而且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也是昏然不觉，难以对现实有所救助。

在士大夫阶层一片“万马齐喑”的沉闷气氛中，纷至沓来的内忧外患，使得一部分思想敏锐、怀才蓄志的中下层士人警觉起来，他们开始从脱离实际的学术中抬起头来，转向充满忧患和危机的现实，为解决社会问题寻找出路。他们重新倡导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遂导致嘉道之际经世之学的复兴。

一生经历乾、嘉、道、咸四朝的包世臣（1775—1855），曾叙述他由醉心科举走向经世之学的过程，颇有代表性。他幼时承父教，“为八比六韵”，习科举之业。成年以后，因时势的刺激，“慨然有志于权家，求其书于市，并得法家言，私兼治之”<sup>③</sup>，进而研求农政、刑名、河工、漕运、盐法、战守、货币等实学，成为一代著名的经世学者。

同时期的龚自珍（1792—1841），幼时受教于外祖父、汉学家段玉裁，在音韵、考据方面颇有造诣，后在时势的趋迫下，走向经世之学。另一位学者魏源（1794—1857），青年时曾先后师从宋学家和汉学家，后来也由于时势的刺激而走上经世之学。由贺长龄倡议和组织、魏源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于道光六年成书，次年刊行，就是经世之学再起的标志。这部数百万字的巨

姚莹：《东溟文集》卷1《师说上》。

管同：《因寄轩文二集》卷1《说土上》。

包世臣：《安吴四种·总目叙》。

编，精选清代经世文章的力作，一经出版，即受到留心经世实学人士的欢迎，书商屡屡翻刻，士人竞相研读，推动了经世思潮的复兴。

这一时期的经世之学，大致可区分为由理学和今文经学发展而来的两个学派。一些由理学走向经世之学的人士，看到官场、士风的衰败，民众的屡屡“犯上作乱”引起社会的动荡，深感空谈性理无补于现实。于是，一方面强调理学的“躬行”、“践履”等内容，以有益于“世道人心”；一方面开始注重“经济”，研求实政、经世之学。在理学盛行的湖南，就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物。如唐鉴、罗泽南、丁叙忠、曾国藩、左宗棠等，他们提出了“守道救时”的口号，注意研究水利、盐务、钱法、舆地、边疆、兵法实政之学，曾国藩更提出了“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学并举的观点，将经济实学放到了学术的重要地位上来。但是，这些理学派经世学者，由于固守君臣之道和华夷观念，只注意于河、吏、盐、漕等具体政务，而对带根本性的社会政治问题，及已露端倪的西方之患，并未触及。

另外一支深受今文经学影响的经世学派，继承了今文经学“通经致用”、“微言大义”，援“三统”、“三世”说以言变革的传统，大胆主张改革。龚自珍和魏源就是这一学派的突出代表。他们上承今文经学“授经议政”的学风，不仅研求具体实政，而且还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力求探寻社会的根本性病因。首先，他们抨击专制君王“伦纲独断”，使君臣关系成为主奴关系，“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使其有力强武”<sup>①</sup>。他们指出，正是因为后世专制君王以“势、利、名私一身，穷天下之乐而不忧”，所以才引起觊觎争夺之乱，使社会动荡不安。<sup>②</sup>其

《古史钩沉论一》，《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第 20 页。

② 《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第 43—44 页。

次，他们对土地的高度集中表示了深深的关切。针对清中叶以后权贵豪强兼并土地，无田者日益贫困的现实，龚自珍指出，如此贫富不均的状况发展下去，将使“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最终会导致“丧天下”的严重后果。<sup>①</sup>此外，他们还对比科举制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抨击科举制度使士人群趋无用之学，造成朝野内外人才匮乏。所谓“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sup>②</sup>。他们指责科举制度已成为束缚人们心志、压抑人才的腐败制度。

与此同时，龚、魏等经世学者们还力图为统治者寻找“振起而补救”的方法。他们提出了“更法改图”的变革主张。龚自珍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sup>③</sup>魏源也指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sup>④</sup>他认为：“小更革则小效，大更革则大效。”<sup>⑤</sup>他们这种迫切要求“更革”、“变法”的强烈呼声，在当时举世昏然之中，起到了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

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引导下，当时已日益严重的西方侵略威胁，也引起了这些经世派人士的注意。他们的视野开始由边疆扩大到海疆，由时务扩展到“夷务”。如经世学者姚莹曾说：“自嘉庆中，每闻外夷桀骜，窃深忧愤，颇留心兹事，尝考其大略。”<sup>⑥</sup>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夕也注意到西国以通商为名，行侵略之实的情况：“吁嗟领海，大窦大庖，海人来商。……遂瘠南东，丧金万万，食妖（指吸鸦片）大行。……维海之西。有英吉

① 《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 78 页。

②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 6 页。

同上。

③ 《筹鹾篇》，《魏源集》下册，第 432 页。

④ 《御书印心石屋诗文录叙》，《魏源集》上册 第 243 页。

⑤ 姚莹：《京轶纪行·自叙》。

利，隆鼻高眶，环伺澳门，以窥禹服，十伍其橈。”<sup>①</sup>这些议论反映了他们对西方侵略威胁的警觉和忧虑。

在这种经世学风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覬觎祖国的西方国家进行了解和研究，出现了专门记述西方的书籍，如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和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二书，均成于鸦片战争前的十年间。这两部书记述了中英贸易史，认为中英开展贸易以来，英国一直垂涎葡萄牙人得居澳门之利，对中国“常鞅鞅生覬觎之心”。萧令裕甚至预言：英国对华侵略“十年之后，患必中于江浙，恐前明倭祸，复见今日”<sup>②</sup>。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这一预见。鸦片战争爆发后，经世派人士更加注意了解外国情况。林则徐在广东主持禁烟时，就“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sup>③</sup>，组织人编译介绍西方情况的《四洲志》和《华事夷言》。这些人士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进的中国人。

## 西人办报等活动与林则徐翻译西报

办报、办教育等，是西方人在进行殖民侵略的所到之处进行文化扩张活动的重要形式，他们在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早在 19 世纪初，在中国周边地区活动的西方人，就已经开始创办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报刊了。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等在马六甲出版了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初印 500 册，后增至 1000 册，免费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其

《赠两广总督谥敏肃涿州卢公神道碑铭》，《龚自珍全集》，第 144—145 页。

② 包世臣：《答萧枚生书》，《安吴四种》卷 11 《齐民四术》。

③ （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174 页。

中一部分由专人带往广州，和其他宗教书籍一道，分送给参加县试、府试和乡试的士人。此刊至 1821 年停刊。这是西人创办的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此后，西人在南洋、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创办了一批中、外文报刊。至 1840 年以前创办的主要有：

（特选撮要每月统纪传）（1823—1826），中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依泾杂说）（1828—），中文，澳门。

（天下新闻）（1828—1829），中文，马六甲。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33—1837），中文，广州、新加坡。

《各国消息》（1838—），中文，广州。

（蜜蜂华报）（1822—），葡文，澳门。

（澳门钞报）（1834—1838），葡文，澳门。

《广州纪录报》（1827—1845），英文，广州、澳门、香港。

（中国丛报）（1832—1853），英文，广州、澳门等。

其中，《蜜蜂华报》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外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该报共出版了四卷。

在西方人创办的这些中外文报刊中，中文报刊是以中国人或海外华人为读者对象的。它们的主编人大部分是西方传教士，其内容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主要是宣传基督教，并宣扬中外友好，以消解中国人的疑忌。他们自称“博爱者”、“爱汉者”，并表示，他们不远万里而来，只是为了“阐扬宗教”和“促进人类之道德”，对中国毫无恶意，中国人应该“视万国当一家”，“视外国人与中国人当兄弟”，以共结“外中之绸缪”等等。①此

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15 页。

外，这些报刊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新知识，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就登载过论述蒸汽机、世界地理、英美政治和华盛顿的生平等文章。但这时期中文报刊的种类不多，在内陆也只是广州才有，因而能看到这种报刊的中国读者很少，其影响也是很有限制的。西人的大量办报及在中国较大规模地发行，还是 1840 年以后的事。

除了创办报刊外，在华的西人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化活动。如 1834 年，在广州的外国侨民成立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宣称以传播技艺和科学，启迪中国人智力为宗旨。1836 年，西人在广州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以“改进和推动中国的教育”为宗旨。1839 年，该会在澳门创办了一所马礼逊学堂，招收中国学童。

这些西人进行的办报、办教育等文化活动，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接触西方文化开辟了一个窗口，虽然这一时期能够接触到这些文化信息的中国人还是十分有限的，但随着中西关系的日益密切，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愿望随之上升，一些中国人开始主动利用这些窗口来了解西方。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备战期间，为了了解西人的情况，随时掌握其动向，就曾“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组织人翻译外文报刊，选译新闻和评论，编为《澳门月报》，每周或每月抄报一次，并上呈道光帝，以供参考。他还组织人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原书于 1836 年伦敦出版）译出，名为《四洲志》。此书记载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是当时“了解夷情”的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书籍。林则徐组织的这些翻译西书西报的活动，代表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主动了解西方的新趋向。

## 俞正燮对妇女贞节观的批评

要求妇女遵守“三从四德”，尚贞守节，是封建礼教“为妇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清统治者沿袭前朝成法，有旌表贞节制度，对以身殉夫殉亲的烈妇烈女、夫死不嫁的节妇、未婚守节的贞女等均予以表彰。被旌表者可树立贞节牌坊，表现突出者还会被载入方志，甚至还有可能被记入国史，因此被视为其家族的荣耀。但妇女本人则要忍受终生的痛苦，甚至牺牲掉生命。统治者把这种摧残妇女的礼教，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持民风纯正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旌表贞节制度的倡导下，无数妇女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据《清史稿·列女传》记，每年各地方官上报的贞节妇女的人数都达数千人。

清代中叶以后，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和理学的衰微，世风民俗日见浇薄。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对人民的控制，强化封建礼教的作用，继续加强旌表贞节的措施，各地方官经常向礼部疏报在民间采访的贞节妇女，请建牌坊旌表。如 1834 年 1—3 月间即有：陕西巡抚疏报采访咸宁等 36 个厅州县贞节烈妇 8675 人；安徽巡抚疏报采访和州贞节妇女 1260 人，桐城县贞节妇女 3163 人；河南巡抚疏报固始等 4 县贞节妇女 847 人，滑县等 7 县 475 人。<sup>①</sup>合计以上仅 3 省 49 个厅州县，三个月内就访有贞节妇女共 14420 人，而仅安徽桐城县一县，就有 3000 多人。可见贞节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之广之深，广大妇女深受这种贞节观念的束缚和毒害，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和幸福，而社会上下却一致认为是节操高尚，理所当然。

但是，伴随着理学的衰微和学术风气的活跃，这一时期也出

<sup>①</sup>《清实录》卷 246，第 703 页；卷 249，第 752 页；卷 250，第 780 页。

现了一些背离礼教传统、同情妇女命运的议论，本年辞世的俞正燮就是这样一位代表性人物。

俞正燮（1775—1840），安徽人，道光举人，晚年主讲江宁惜阴书院。他学问渊博，文通百家，擅长考据，在当时士林中颇有名气。他在 1833 年所著《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书中，写了《女》、《妻》、《女人称谓贵重》、《贞女说》、《节妇说》、《妒非女人恶德论》、《出夫》等文章，一反文人卫道的说教面孔，而以考据的形式，借古说今，批评了封建礼教贞节观念的陋俗对妇女的摧残，为妇女所受的压迫和痛苦鸣不平。他在《贞女说》中，对民间提倡女子为已死的未婚夫守节不另嫁，并誉之为“贞女”的风俗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后世女子（未婚夫死后），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

他认为，女子未与其夫正式举行婚礼，没有作过实际的夫妻，世人却以夫妇的名分来要求女子守节，这是有悖于情理之事。他还引用一首诗，抨击福建民间流行逼迫聘妻为未婚夫殉死，迫其做“烈女”以光耀门庭的恶俗：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  
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樽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  
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  
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

诗中描绘的女儿面对摆在面前的毒酒和上吊绳，被逼无奈，满腔幽怨、肝肠欲断的悲惨情景，以及一面是贞节牌坊和“族人欢笑”，一面是女儿怨鬼求返魂的呼号这一强烈对比，读之不能

不令人顿生悲愤和不平。俞正燮对于作为族人及家长的男子，如此残忍、卑劣地以女儿的生命来换取家族的荣耀，指责道：“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

俞正燮在《节妇说》一文中，对汉以后民间奉行“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的传统观念，要求妇女在夫死后应守节的习俗提出指责。他认为，古代圣贤所制之礼，是“妇无二适之文”，“男亦无再娶之仪”，夫妇男女都应平等地遵守齐一之义，终身不改。而后世的人们却误解了古圣礼义，只片面地对妇女提出守节的要求，这是不合理的。他指责道：

自礼意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礼义无涯矣，而深文以网妇人，是无耻之论也。

他指出恰恰是男子自己不守古礼，既不顾“夫妇同尊卑”之义而“卑其妻”，又不守“终身不改”之礼而“出妻”或“再娶”，却转而苛求妇人为之守节，这是不合于礼义的“无耻之论”。因此他提出，对于夫妇男女应平等对待，即“女再嫁，与男再娶者等”，“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

俞正燮对于民间流行既久、视为当然的“贞女”与“节妇”等摧残妇女的陋俗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虽然还只是限于引用阐释经典，在传统的基础上对妇女问题进行反省与思考，还未达到近代人权观念之上的男女平等思想的高度，但却显示了在鸦片战争前社会动荡、礼教衰微、思想活跃的时代，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礼俗文化及沿袭千百年、封建礼教最为强固的夫妇之道和妇女观。鸦片战争二三十年后在一些地区发生的社会风俗及妇女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以及人们礼俗观念的变化，除了受到西方

文化影响的因素外，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自省和更新的继续。

##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鸦片战争在继续进行。英军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等地。广州三元里人民展开抗英斗争。

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实际斗争中，产生了大量诗歌、揭帖、说唱等大众爱国文学，起到了鼓舞人民起来反抗侵略者的宣传作用，同时对文坛诗风也产生了影响。科举制度的腐败，促使有识之士呼唤教育文化的改革。

### 反侵略大众文学及新文风的出现

1840年6月，当英国派遣军舰抵华，正式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广大民众对烟贩的道德义愤扩大为对西洋人侵略祖国的正义反抗。在侵略者所到之处，当地绅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工具、农具为武器，打击侵略军，形成了民众群起抗战的壮观局面。

在这一民众运动过程中，广大士绅民众需要抒发情怀，相互鼓动，以及宣传和联络，遂出现了大量诗歌、揭帖、说唱等大众文学作品，鸦片战争后还出现了一批反映抗战情况、歌颂抗战事迹的文学作品，形成了这一时期由民众反抗侵略运动而引起的大众文学热潮。如诗歌，仅流传下来的就有不少。林昌彝《射鹰楼

诗话》收录了鸦片战争时期在两粤一带流传的诗歌 20 余首。谢兰生《咏梅轩杂记补遗》中收录了不少当时在江浙一带流传的诗歌。另外有《戊戌感事十八韵》、《粤东感事》18 首、《枯杨词》18 首、《京口驿题壁》18 首、《闻警纪实》14 首、《广东纪事新诗》12 首、《定海失陷诗》10 首、《广东感时诗》6 首及《题虎门炮台》、《京口夷乱竹枝词》等。<sup>①</sup>仅现代由广东省文史馆编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 1978 年第 1 版）中，就辑录了反映这一斗争的诗歌 94 首。

这类大众文学作品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声讨侵略者，鼓动人们起来斗争；二是歌颂爱国军民英勇抗敌及斥责一些官吏腐败无能。就前者而言，主要反映在各地人民所写的揭帖、文告中。如《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粤民檄英夷文》、《乡民讨英夷檄》、《三元里居民示喻英夷》、《宁波众义民公启》等。在这些文告里，人们愤怒谴责侵略者的暴行：“据我土地，戕我文武，淫我妇女，掠我资财，致使四省生民，惨罹锋镝……盖暴其罪状，罄竹难穷；洗我烦冤，倾海莫尽。”他们宣告：“全粤乡民数千百万之多，……志切同仇，恨声载道”，“南极省垣，北抵韶郡，不期而会者二百余乡，守望相助者数千余里。……共立奇勋，各思敌忾；上报国恩，下除民害”<sup>②</sup>。许多诗歌歌颂了人民英勇抗敌的事迹。如张维屏的《三元里》云：“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魏源的《前史感》有云：“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

鸦片战争后，在 1846—1847 年广州社学所领导的民众反入城斗争中，广大绅民也充分利用揭帖、文告等形式，宣传和发动民

见阿英：《关于鸦片战争的文学》。

同上。

同上。

众。如有的揭帖写道：“赃官悞 误 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倘夷入城，鸣鼓攻之。”<sup>①</sup>另有一则写道：“广东多扰乱，总系这龟精（指耆英等顺从‘洋夷’的官吏），治鬼无方法，剥民有才情。倘欲除番狗，不离社学兵，义勇齐心力，尽忠答天庭，踊跃向前进，万古标姓名。”<sup>②</sup>这些揭帖内容在民间流传开来，对鼓动和团结民众，奋起反抗“洋夷”及违悖民心而顺从“洋夷”的官吏，起到了十分有效的宣传效果。

英国以保护走私鸦片而发动侵略战争，边海告警，举国震动。因此，不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反侵略诗文风行民间，而且在北方和内地也出现了不少谴责外国侵略者、歌颂爱国军民英勇抗击侵略的诗文，与东南地区的爱国文学遥相呼应。如天津就有几位这样的诗人。华长卿，在鸦片战争期间，先后写了《禁烟行》、《后禁烟行》、《苦霖行》、《谈兵》、《南风行》、《负尸行》、《七月二十一日记事》等诗作，谴责侵略者的暴行，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如《禁烟行》中描写鸦片泛滥对人民的残害：“罌粟花开香馥馥，鸦飞不到婴儿哭。恶烟熏天带血腥，流传海内成鸩毒。……珍馐果腹色如菜，鲜衣披体身似丐。”在写于战争爆发后的《南风行》中，声讨侵略者的猖獗，歌颂爱国将士的英勇抗敌：“飓风猛烈巨涛狂，可怜定海盈城血。……蛮军猖獗飘洋走，登莱镇帅能坚守。扬风万里逐秋涛，乘风直到津沽口。”文中还对琦善等怯懦畏敌、屈从侵略者的行径予以鞭挞：“开门揖盗礼倏饶，两纸蛮书万手抄。刁斗声从云外息，兵戈气向云中销。”在另一首诗中痛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屈辱和约：“老夷盘踞居中坐，我朝将相左右个。……早知今日城下盟，悔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 269—270 页。

（日）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 286—287 页。

不当时力守边。”另外，梅成栋所写《夷匪弃厦门复陷定海，镇将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三公同日战歿。八月十七日贼陷镇海，钦差大臣裕公谦殉节记事四首》，热情歌颂了不惜生命而英勇抗敌的爱国将士，称赞他们：“惟以丹心摧烈焰，欲将赤手障狂澜。”“指挥猛将出奇兵，炮火光中舍命争。……飞空冻雨忠魂泪，裂地警涛阵鼓声。两度舟山虽陷没，胆寒知己慑长鲸。”另有杨光仪记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天津抗战的诗作，歌颂大沽抗击战中浴血奋战的爱国官兵：“战苦神弥旺，刀头带血扞。垒边飞动火，天上返忠魂。”<sup>①</sup>

这些在鸦片战争时期流传于祖国南北广大地区的爱国文学作品，大多通俗直白，琅琅上口，易懂易记，既舒畅地表达了民众的思想感情，又便于在民间流传。其中有的是一般民众的自己创作，有的则是文人学士为适应民众的需要而抛弃了正统诗文规格的束缚，有意力求更贴近于民众的口味，使文笔更加通俗化。这反映了社会的动乱不安，增强了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文化沟通，是近代以来通俗直白的新文体孕育的征象。同时，反侵略大众文学在民间的流行，也使中国民众在刚刚开始接触西洋人时，首先看到的是他们作为走私烟贩和侵略者的不道德形象，这在广大中国民众的心理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

在现实的刺激和经世学风的影响下，文人的学风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撰写当代史就是这时期的一种学术新风。以往在考据学风的影响之下，文人治史往往一味考辨古史。然而，鸦片战争的刺激，使一些经世学者开始着眼于当代。他们为西方侵略者的猖狂气势所震惊，为中国战败求和的奇耻大辱而激愤，还为战争中爱国军民英勇抵抗侵略的事迹所感动。在强烈的爱国感

① 见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03—306 页。

情的驱使下，他们着手记述、总结这一重大事变，撰写当代史。

首开这一学术新风的是魏源。他有感于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朝政腐朽、兵备废弛，以致无力抵抗外来侵略的现实，发愤写作清朝军事史，于 1842 年完成了《圣武记》一书。他自述写作此书的情形道：

晚侨江淮，海警飘忽，军问沓至，忼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指与英国签定《南京条约》）之月。<sup>①</sup>

该书以纪事本末体裁，记述了清朝前期的武功盛事，进而探讨用兵成败之道。魏源试图用当朝前期的武功之盛，来激励国人抵御外国侵略的信心和勇气，可见他是抱着极其强烈的经世目的和现实感来写作《圣武记》的。

魏源的另一著作《道光洋艘征抚记》，更是直接记述鸦片战争的首创之作。该书写成于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当绝大多数中国人尚未来得及从战争的打击下清醒过来，魏源便以相当详尽的文字记述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始末。在该书中，魏源记述了林则徐、关天培等人和沿海军民英勇抗击外敌的事迹，揭露了道光帝的虚骄，以及琦善、奕山等投降卖国和临阵脱逃的丑恶行径，同时，还针对战争期间我方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补救之策，力主“购洋炮洋艘”，“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sup>②</sup>。在这里贯穿着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真知灼见。

在魏源之后，记述鸦片战争的史著还有梁廷弼于道光末年完成的《夷氛闻记》。该书追溯了英商在广东等地进行鸦片贸易的

① 《圣武记叙》，《魏源集》上册，第 206 页。

② 《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 206 页。